

科教兴国呼唤教育家

China's Rejuvenation by Science and Education Requires Educators

许金焜

(北京医科大学, 教授 北京 100083)

有一个非常有趣且意味深长、引人深思的现象: 在全国 12 亿多人口中, 能说出 5 名当今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姓名的, 人数之众可能会以亿计; 而能说出 5 位现任大学正校长姓名的, 人数之寡可能以千计足矣。两者相较,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相差十万八千里。

中国人素来望子成龙, 渴望子女入大学深造的, 对国内的大学耳熟能详。照道理, 爱屋及乌, 对这些大学校长的姓名不说是如雷贯耳, 起码也应该相当响亮, 让人肃然起敬才是。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在“科教兴国”口号如此深入人心的今天, 在教育名义上摆在战略发展优先地位的今天, 大学校长的声名何以衰微到如此程度? 不免让人心忧!

一、3 位伟大的教育家

中国历史传统上是尊师重教的国度, 我国世界的教育家孔子的名字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其名盖过秦皇汉武, 其功高于唐宗宋祖。他虽食粗粮、饮生水、曲肱而枕, 然, 学遍六艺, 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作“春秋”, 享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誉。他主张学与思相结合: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提倡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可谓名符其实的万世师表。

我国近代伟大教育家蔡元培力主废经学、改学制、兴新学风和新校风、尊诸家学派、广揽博学专才。他以美育替代宗教, 力主“兼容并包”, 力行教授治校, 倡导学术自由、科学民主, 使北京大学的精神和面貌为之焕然, 为之一新, 遂使北大演进为“五四”运动的思想发源地。“五四”的精神“五四”的思想也终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成为激励和鼓舞一代代国人发奋图强、追求光明、追求民主、追求科学的无穷动力。而令人遗憾的是蔡元培这一伟大教育家的形象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宣传和发扬。更有甚者, 在 1998 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 某大报竟把屈膝依附于“四人帮”的某历史学家与蔡元培相提并列, 实在是将蔡元培和

“五四”精神难释的亵渎。

解放后, 有思想、有担当的教育家, 当首推蒋南翔。1966 年以前的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众多的高水平的学者、专家和皎皎者, 只要数一数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和著名企业家中清华学子的人数, 就足以说明蒋南翔办学有方, “南翔教育精神”确有其独到、有方之处。

“南翔精神”在当时的清华大学是很叫得响的, 也是很得人心的。它与当前世界的教育思想, 与哈佛大学校长尼尔·陆登庭的使学生“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 塑造健全完善的人格”颇多不谋而合之处。它主要体现在:

1. 专业设置的前瞻性 早在我国原子弹规划、研制试爆之前, 在清华, 相关的专业设置上就早已有布置, 大有清华大学也要造出原子弹的某种雄心和气概。

2. 注重基础教育 大学前三年, 狠抓基础, 雷打不动, 甚至不惜开起顶风船。清华明文规定, 大学三年级前的学生不参加“四清”。须知, 这个“不参加”是在极左思潮人物已颇具权势的时候提出来的, 需要非凡的勇气和魄力, 它使当年多少清华学子身受裨益、感念至今。

3. 塑造自立的人格, 反对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 在那满报纸都是战无不胜的……思想, ……伟大胜利的年代, 蒋南翔却坦然向全校师生发问: “乒乓球打赢了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要是打输了呢?”他还掷地有声地说: “我今天就是要特地丑化形而上学, 引体向上到了筋疲力尽再也拉不上去的时候, 即使把‘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念上一千遍, 还是拉不上去的!”老校长的这种出自肺腑的坦诚教导, 铸就了多少清华学子自主明断的人格。

4. 提倡多学科交叉 那时的清华, 周末生活丰富多彩, 小说、诗歌、电影、体育、艺术等等讲座不一而足、精彩纷呈, 会场上还常常人满为患, 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很多人就是在那个时候, 知道了莎士比亚、普希金、贝多芬、卢梭、黑格尔的。这与当今大学

周末除了舞会还是舞会的极端单调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文理工农医交叉,并非只有院校合并一途,并非唯并大、并全一条道走到底。若能多搞些周末名师讲座,且辅以学分制,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 时时处处把学生放在中心位置 这在思想观念上如此,在教学中如此,在生活上也同样如此。在经济困难时期,抽调品德意识上最强、最少私心杂念(当时叫大公无私)的同志管理食堂,使学生的饭碗里足斤足两,保住了多少学生的身体健康!联想现在的诸多大学,学生食堂大师傅月月奖金超千元,却时不时地发生学生罢食的情况,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此外,蒋南翔在因材施教、发展个性、鼓励创新、全面发展方面也有颇多独到之处。

应该说,“南翔精神”是座含金量很高的矿藏,令人惋惜的是至今似无人想去挖掘、提炼和发扬。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实际上为教育改革提供了空前广阔的舞台,为高校改革创造了空前优越的条件,为教育家的涌现提供了多少年来少有的机遇。照说,这段时期应是教育家辈出的年代,然而事实远非如此。这从20年来高等教育改革的历程可以得到印证。

二、20年来高校的改革历程

最近,许多有识之士纷纷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顽固和最后的计划经济哪里找?到教育部门去找”、“中国最后的卖方市场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是中国短缺经济的最后阵地”、“从原苏联移植过来的体制没有一丝一毫的触动,高校内部阻碍教育发展的桎梏没有一丝一毫的破除”……所有这些坦诚赤见,一语中的。20来年的高等教育改革状况就是如此,竟是如此,真是匪夷所思,令人百思百叹,不得其解。

当然,改革年代,口中不说改革的人基本上是没有的,新闻媒体上时不时炒作的“高等教育改革”还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比如:

1. 把大学办成教学、科研、经济中心 这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提出来的,提出者被誉为改革家。众所周知,大学有科研型、教学科研型、教学型之分,笼而统之提出都要办成科研中心,显然没有具体大学具体分析。至于经济中心,颇具独创性,与时下的产学研的提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不管怎么说,世界上尚无大学成为经济中心的先例。把“产”字放在第一位也是很值得怀疑和商榷的。

2. “馅饼教授”事件 一位教授卖馅饼,本来是当时体脑倒挂和知识分子生活窘迫的无奈结果和反映,却引来报纸、电台、电视台的狂炒。什么观念

的彻底转变啦,什么与传统的毅然决裂啦,什么开了教育界的先河、勇敢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啦……现在回想起来,纯粹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政治敏锐的“先知先觉”者们的一场狂热闹剧。

3. 学期制改革 由某名牌大学倡导和实行的一学年三学期制,很是风光了一阵子,赢得颇多赞誉并被推而广之。但热闹了没多久,许多院校又悄然无声无息地恢复了一学年两学期的老样子,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有道是,科学的符合客观规律的事物必定有很强的生命力,三学期制如此短寿,可见它并不符合国情和国内教育环境的内在规律。二学期制恢复后并没有被说成守旧、复辟,可见当时的三学期制压根儿就算不上是一种改革。实际上,三学期制与热闹一时的夏时制何其相似乃尔。这其间人为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太过明显了。实行之,谓之有莫大优越性;取消之,又称优越性莫大。这其中,唯一少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多的倒是心血来潮的主观臆断式的决策。

4. 收费制度的改革 从招少数交一定费用的自费生入手,进而实现公费与自费的并轨。从结果看,设计者用心良苦,且非常成功。但随着高等教育产业化讨论的日益升温,收费标准大有水涨船高之势。另一方面,我们又切切实实地看到,收费之后,学生实验室的仪器并未见更换和增添,这使人感到某种“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味道。况且,在下岗风浪之下,学生的勤工俭学毕竟比发达国家困难得多,能有幸打上工的,收入要少得多,假期也短得多,更何况许多高校的勤工俭学实际上已处于名存实亡状态。因而收费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千万别视为如探囊取物般容易,而“长驱直入”。要切切顾及学生、家长们的难处,要视校情、国情有步骤有条理有区别地进行方妥。

5. “211工程” 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211工程”,意在出人才、上水平、促改革、增效益,被誉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跨世纪战略工程,也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地风火了好几年。今天仔细观审下来,总觉得不免带有某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遗风和味道,还有某种“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余勇。

以笔者之见:

(1) “211工程”,牵涉数百亿元的投资,却并没有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实施时又明显地带有主观圈定的特征。

(2) 过分强调和看重“大树特树”在创建一流大学中的作用,忽视一流大学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一客观规律。在这一点上,一流大学也与“权威”极其相似:权威不是大树特树立得起来的。美国近年崛起的国际一流大学——斯坦福大学,其声名的鹊

起缘于“斯坦福大学创造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因而“斯坦福——硅谷，硅谷——斯坦福”不胫而走。

(3) 我国的重点高校数目历来是多变的，21 世纪 100 年间不再变化根本不可能。1954~ 1963 年，重点高校为 68 所；1978 年~ 1981 年，为 96 所；1984~ 1991 年，有 8 所、10 所、10 多所 3 个版本。“211 工程”的 100 所与上述 68 所、96 所有质的区别，与 8 所、10 所、10 多所则有些一脉相承的，即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那么，国际上现在有多少所一流大学？再过 100 年，国际上又将会有多少所一流大学？谁能说得清楚呢？！

在“211 工程”的部门预审中，大多数大学都把发展目标定位于世界一流。诸多的校长一腔沸腾血、满纸豪迈言：“到下世纪初叶，把××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本世纪末，跻身亚洲一流大学前列”、“再经一二十年的努力，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等等，应该说，精神诚可嘉。不过，国际上公认的一流大学的标准之一是培养了多少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现在已经是世纪末了，说实在的，目前连参加亚洲大学排名的勇气都没有，又遑论世界前列呢！反正，“历史的经验”是，这样的牛皮吹过之后是没有人追究的。

再者，有些高校进入“211 工程”是以合并为前提的，根据现在高校合并的潮流分析，我国 1 000 多所院校将合并成 200~ 400 所。这样，名义上的 100 所，实际上相当于合并前的 250~ 500 所。结果将是，太多的重点，实际上是没有重点。

经济学上有“弃衣新度说”，即遗弃不穿的衣服越新，说明人民的生活越富足，国家越富强。但，倘若一个改革方案被放弃时还很新，那很可能不是什么旺事、好事，倒肯定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莫大浪费。

(4) 进入 90 年代，21 世纪成了非常时髦的字眼，中外概不能外。好象不提 21 世纪，就是站得不高，看得不远，就是没有战略眼光似的。当然，考虑 21 世纪的发展趋势，未雨绸缪，早作准备，不但应该，而且确实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个度，过了这个度，未免有哗众取宠之意。那种“远瞩”到、预见到 100 年后的高等教育，就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就像 100 年前谁也没有预见到如今的电脑、因特网一样，我们实际上是无法预见 100 年后高等教育的水平、形式、规模的。我们何需这般地自视高明、自以为是呢？！

6. 后勤社会化 现在有个时兴的说法：高校的后勤成了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想不到计划经济的灵感还真能制造天方夜谭式的笑话，怎么非教育因素倒会成了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了？美国的哈佛、斯坦福，英国的牛津、剑桥，校内无

一间学生宿舍，在校生却高达数万人。看来，我们的个别同志虽然知道男人年龄大了会长胡子、会出点子，但那么多年中却偏偏不知道应该早早想出使高校的后勤社会化这个“点子”来。

由以上列出的种种，不难看出：高校改革大大滞后，高等教育改革与科教兴国的目标相去甚远；口号式的“改革”多，脚踏实地的攻坚少；注重形式轰轰烈烈的“改革”多，实质性内涵性的改革少；追求一时轰动性效应的“改革”多，实实在在提高办学效益的改革少；在旧体制上修修补补的“改革”多，真正脱胎换骨的改革少；由少数人暗箱操作的“改革”多，发动广大师生积极参与的改革少；在计划框架内寻找出路的“改革”多，走向市场另辟蹊径的改革少；谋求国家增加投入力度的改革多（实际效果却甚差），发掘民间办学积极性的改革少……。

由此亦不难看出：当今中国，最紧缺的人才教育家，最需要的人才亦是教育家。由此延伸开去，人们自然而然地对教育家的“种子队”——大学校长们寄予厚望。

三、科教兴国呼唤教育家

科教兴国，教育为本，应该说，这为成批教育家的涌现创造了空前的机遇和环境。大学校长，特别是一流大学的校长，应该说与“教育家”已是相距不远了，兴许有的也仅一步之遥了。应该肯定，绝大多数的校长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忠于职守、积极奉献，也令人敬佩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旧的教育传统，从原苏联移植过来的体制仍然顽强地存在着；绝大多数院校头头脑脑的任命制依旧；压制年青人成长的近亲繁殖的沃土——如教研室这样的前沿阵地的存在依旧；只讲投入不讲效率的办学模式依旧；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考试为基本点的教学方法依旧；办学与科研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依旧，且有日益扩大的趋势；管理机构臃肿、“官兵”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依旧；重视学生的共性忽视个性及创造性的情况依旧……。一句话，多少年来，高等教育的内涵几无变化，几无改革。

一个在校生仅几千人的大学，副校长的人数竟是国家副总理的 2~ 3 倍，以至于有“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的形象说法。

对于上述情况，许多校长忧心忡忡、心急如焚。但也有人深居雅堂，久而不见其弊。这居雅堂者往往头重脚轻、思想雷同、忙于事务；往往也会议多多、应酬多多、出国多多、特权多多。

头重脚轻：他们往往身为某个学科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因而坚持不懈地追踪该学科的国际发

(下转第 56 页)

齐沙漠的增强放大所致。毛乌素沙漠每年有 10~22 次沙尘暴发生,本地就是沙尘暴源,因此对高原沙漠必须规模整治。高原面积有 13 万 Km^2 ,以往 40 多年虽经众多点和片上治理,一些地区有所进展,但是还有许多地段存在沙进人退现象。冬春沙尘暴和夏季暴雨是高原整治的两大劲敌,故高原生态治理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

(2) 高原生态建设的规模性 高原地势平坦,近地表气流畅行无阻,局部治理对整个高原沙尘暴影响不大,所以农民春播 2~3 次,甚至于 5~6 次,一次沙尘暴,往往使全年辛苦化为乌有,而低产粮田对草原破坏力极强,故年年都有沙进人退、沙退人进的拉锯战,更难以发挥整体屏障作用。只有把整个高原当作一个生态单元进行规模治理,才能全面巩固成果。

(3) 统一规划分区治理 就高原整体而言水资源只能满足一半不到,但是,高原东南部有较丰沛的降水量,沙漠地下有丰富的地下水,因而应当根据高原各种自然条件合理规划,将高原划分为不同生态等级和不同功能的分区,进行分区治理。

2. 生态建设与产业经济结合

高原生态建设应当与产业经济相结合。在生态条件相对较优地区的开发应当与大型企业集团相结合。高原虽有丰富的资源优势,但资金严重不足,阻碍了高原的整体和规模治理。因此为了进行规模治理,应当广泛与国际组织和国际企业合作,与国内企业,特别是与东南沿海大中企业合作。

(1) 广泛的国际合作 应当在跨世纪的关键时刻向国际组织和企业进行广泛宣传,争取有关国际组织如 UNDP、UNEP、WB、ADB 等的关心,引起他们的兴趣,取得他们的支持和资助,在有关国际组织安排下进行广泛而有序的合作,在世纪之交召开一次“鄂尔多斯高原生态建设国际研讨会”。

(2) 国内合作 为获得大量资金,必须将高原生态建设与规模经济开发相结合,为此高原应实行一套开放政策,世纪之交召开一次“高原生态保护与经济开发全国研讨会”。吸引各省市,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市(包括港澳台)政府官员、企业家、学

者,来高原共同开发。可在毛乌素沙漠选择以盐淖为中心,面积在 1 000~3 000 Km^2 之间的独立地貌单元地区(相当于东部一个县的面积),承包或承租给一个省(市)进行开发,租期 50 年,免交租金,10 年内免税。地方利益是:10 年后生态基本恢复,50 年后生态全面恢复,地方群众增加就业和脱贫致富。允许各承租省(市)在其承租区内进行分割发包。

(3) 与特定企业结合 前文说及的两个能源基地开发与生态建设相结合就是重要实例。再如 1998 年西柳沟暴雨冲沙堵塞黄河干道,使包钢损失 1 亿元。可以考虑将西柳沟流域汇水面积 1 193 Km^2 沙地租借包钢或包头市 50 年。他们将流域治理与经济开发相结合,既解决了暴雨堵塞黄河取水口的问题,又将西柳沟当作该企业(或市)的农副业基地和下岗分流的后方基地。

高原治理与国际国内合作都必须尊重当地农牧民与政府签定的 30 年承包合同;为推动农业产业化,省、市及大型企业承包、承租一个地貌单元后,规划时可将当地农牧民承包区包括进去,但是,在实施时应强调农牧民自愿原则和农牧民收益同步增长原则。

3. 科学技术向生产力大规模转化

为开展整个高原整治,就应当综合以往各种科技成果和经验,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进行。

(1) 大力应用当代高新技术成果 特别是要精确预报冬春沙尘暴和夏季暴雨;抓好先进节水技术推广、速生林草选种和生物工程、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等。

(2) 建立高原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知识库 建立国内科研协作网,集中以往 40 年系统的成果和经验建立知识库,并与因特网相联,在网上提出问题,联系全球专家,征求新的合作伙伴。

(3) 建立卫星—航空监测系统 采用同季节图像,对比监测逐年绿化进度,以严格地评估 5 年、10 年、30 年、50 年间高原生态变迁;并用于骨干林带、封原育草、矿田责任区以及沿海省市及企业承租区绿化进度的检查。该系统还应与全球卫星观测系统联网。

(责任编辑 王宏章)

(上接第 18 页)

展动态;而对国内外的教育学发展趋势却缺乏研究。这从他们发表的科技论文与教育学论文的数量比可见一斑。

思想雷同:看他们教育、教学改革的文章,若不看署名,会认为是同一个人写的。本来,他们作为教育界的“皎皎者”,实应是思想活跃、善于思考、推陈出新的一群。

特权多多:一说起贪污腐败,人们总习惯性地把目光投向党政官员和经济实体的负责人,总认为

高等院校是沙漠中的绿洲。但是,沙漠可以变绿洲,绿洲亦可以变沙漠。一个子虚乌有的会议,仅仅通知上标有“可到香港一游”的诱惑,竟使得智商极高的 40 多位校长竞折腰,辱败穗城。

随着科教兴国的实施,随着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即将来临,高等教育的前程似锦,成批的教育家必将像长江后浪推前浪似地不断涌现,我们有理由期待着。

(责任编辑 蔡德诚)